

■新作聚焦

王凯长篇小说《导弹和向日葵》:

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傅逸尘

读王凯的小说,常会感觉到疼痛。那是一种从青年时代绵延而来的成长的痛感,夹杂着生命的青涩和稚拙,裹挟着大漠的荒凉与粗犷,似挽歌般传递着军人的理想与执著。从军校到沙漠,从机关到连队,王凯小说的生活幅面相对固定,人物大都似曾相识,故事也谈不上有多复杂,反复书写的正是部队基层的日常生活和青年军人的生命情态。

长篇小说新作《导弹和向日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9月版)中,叶春风、钟军、车红旗、兰甘、白雪歌……这些青年军人的成长故事又一次击中了我。现实生活磨炼、砥砺着年轻的生命,虽谈不上苦难,却充斥着无奈与压抑、欲望和沉沦。眼看着青春的激情、锋芒乃至生命本身一点点遁入大漠深处,消弭无形,你不得不服从命运的逻辑,为富于痛感的生存经验喟叹、感伤。疼痛,是生命最为敏锐的感觉,也是王凯小说最有魅力的美学质素。这疼痛关乎世俗、欲望,关乎爱情、成长,最终指向的是理想和信仰。小说的结尾宛若寓言般,绽放出灿烂夺目的精神光芒。始终葆有赤子之心的叶春风,终于跳脱了世俗欲望的羁绊,穿越了幽深的时光隧道,闯入一片充盈着理想情怀和英雄主义的精神荒原——似重获新生般,打量着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沙漠,脑际陷入一片轻盈的迷惑。王凯以一种极富象征色彩的抒情笔调,回望疼痛缠绕的军旅青春,在生命的自我省察中描摹出军人灵魂的面貌。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泰戈尔在《园丁集》中更多地融入了青春时代的体验,细腻描绘了爱情的幸福、烦恼与忧伤,成就了一部青春恋歌和生命赞歌。王凯的《导弹和向日葵》又何尝不是呢?他深谙部队生活的现实种种,以辛辣而又戏谑的笔调,真实生动地揭露了过往军队内部存在的不堪和暗面,将部队领导、机关干部、连队官兵等人物形象塑造得穷形尽相。尤其是将外部世界对个体生命的威压和规训书写得细致入微,令人感同身受。然而,王凯并没有沉溺于生活的疼痛本身,而是将尖锐的痛感转化为宽广、坚韧、通透的人生态度;他的文字充盈着厚重的现实经验和超拔的哲学思辨,似歌者般吟唱着军旅生活宏阔辽远、高蹈正大之气象。

二

当下青年作家的写实能力渐趋下降。大家似乎过于依赖观念和想象写作,能够细致入微地再现某种场景、生动深刻地塑造人物形象的作品实在太少了。在一个主观倾向占上风的文学时代,我们通常很难读到像生活一样真实、鲜活、饱满的客观性作品。但在《导弹和向日葵》中,我们不仅读到对沙漠天气、风物及环境的精确、优美的描写,还能清楚地看到人物的外貌、行动、言谈和性格,连同他们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也同样精确而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说,小说家在作品中成功地表现深

刻的主题内容和博大的思想情感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那么,追求小说真正意义上的客观性效果就难上加难。要写出客观性的作品,需要作者花费更多的心力,需要足够的耐心进行认真的观察、冷静的分析和慎重的判断。

小说虚构性的想象不管多么诡异、奇特,最后都必须服从生活经验逻辑和内心情感逻辑的制约。就像巴尔加斯·略萨所说的那样:“不管小说是多么胡说八道,它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经验之中,从中吸取营养,又滋养着人们的经验。”小说家若想更逼真地还原生活,使作品褪去浮华和造作,就必须对鲜活真实的世界充满敬意,就必须具有朴素诚恳的情感态度。王凯对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军营,对自己同代人的军旅青春都怀有深深的敬意和浓厚的兴趣。他秉持一种理性而扎实的客观态度,因而得以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现实生活,更细致、更真实地把握外部世界。他笔下的军旅生活,具象而沉实、细腻且绵密,对于小说中的人物,不管地位高低,无论正面反面,王凯都怀有一种深沉的情感——悲悯与诚挚的爱。正是这种悲悯的情怀和感同身受的理解,使得那些远非英雄甚至不那么正面的人物如车红旗、兰甘、曹助理、凌科长、白雪歌等等,虽然有着道德、性格、或行为上的缺陷和瑕疵,依然会在某一时刻流露出质朴、善意与诚挚的一面。正是基于对现实经验的熟悉,王凯没有拘泥于表浅的日常事象,更不愿做出廉价而浅薄的价值判断。他选择沉潜入现实生活的深层肌理,再反身而出,试图以一种跳脱和超越的视角赋予现实生活以一种整体性的观感,对人物的现实遭际和精神困境抱以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小说主人公叶春风,尽管在很多事情上表现出幼稚与迷茫,但内心深处纯粹、清高,有着浓烈的英雄情结,而且能一以贯之地坚守,不因境遇的改变而令心灵蒙尘;在经受了种种潜规则和世俗欲望的考验之后,依然不失赤子之心,最终收获了精神的成长和灵魂的超越。王凯在故事层面进行批判和思辨,而在人物身上寄寓激情和理想,这正是小说动人之处、价值所在。

当下的青年作家在小说叙事中,总是显示出一种简单和片面的倾向:每每将一种情感结构推向极端,而缺乏在复杂的视域中平衡地处理多种对立关系的能力。《导弹和向日葵》则始终是在复杂的网络中展开矛盾冲突和情感纠葛。叶春风和他的同学们尽管拼尽全力、左支右绌、心力交瘁,却依然难以实现自身的抱负与理想,只能为了现实利益、仕途进步甚至爱情婚姻而委曲求全、互相倾轧、遍体鳞伤。

在巴丹吉林沙漠的军营中,爱情无疑是一种奢侈品,是年轻军人们赖以确证自身生命存在的重要象征。小说中的爱情书写,作为一条重要线索贯穿全篇,令人唏嘘、震撼。在艰辛与孤寂中,爱情既可以彼此温暖、抚慰;也可以作为一种稀缺的商品,交换世俗的利益;更可以被多舛的命运玩弄于股掌间,暴露生命的卑微和人性的丑陋。女性人物尽管依然不是王凯小说的重点,但是白雪歌这个人物写得尤为精彩。小说结尾处,这个看似心机深重、行为放荡的女孩

■创作谈

我从小在戈壁滩上的空军基地长大,军校毕业后又回到那里,从技术员到排长,从连队指导员到宣传干事,从少尉到少校,直到快30岁时才离开。那时我很想离开基地,尽管我很爱戈壁滩夜空中的星河。作为一个穿着军装的凡夫俗子,我觉得我应该有一个比戈壁滩更像点儿的安身立命之处,然而等我真的离开以后,却又不能不时时怀想。如今我已经在城市生活了不短的年头,但我基本没写过城市的生活。我始终觉得我与城市是隔膜的,城市夜空的星星永远与灯火成反比。内心里,我更愿意把自己当成一个驻守大漠的军人,也许只有把自己放置于那一片荒蛮之地,我才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军人的价值乃至人的价值。所以直到今天,我写的仍旧是漫风永不止息的河西走廊和巴丹吉林沙漠,而《导弹和向日葵》就是其中最耗费我心力的一篇。

这个题目和小说中所有人物的名字一样,都来自我喜欢的唐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只是有的换了一些同音字,好让它们看上去更像一个名字,有的则原封未动,比如小说中的“白雪歌”。因为这首诗,让我觉得小说里的人物都有了某个确切的出处,也仿佛给了我一个写作征途上的立足点。在我看来,岑参这首诗和很多边塞诗不同,既有严寒也有热血,既有悲怆也有雄浑,诗句掺杂着许多莫可名状的复杂心绪,而不仅是通常所见的激昂或者伤感。所以写作时,我也很希望自己的小说能有一点这样苍茫又细腻的滋味,很希望自己的小说能更充分地表达出军人内心丰富的情感。

这个小说中的很多生活细节是我亲身经历的,比如我军校毕业刚分到基地时,就曾跟着老兵学习地空导弹燃料加注专业,那时我对加油车上的阀门和管道毫无兴趣,盛夏戴着防毒面具训练时憋屈的感觉宛如昨天,鼻翼间似乎还留存着导弹燃料极其特别的味道,所有这一切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小说中写出了一部分自己,或者说,写出了诸多自己的一个。但又不止于此。因为我想写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活,更是我们一代军人的生活。在我看来,辽阔的戈壁大漠不仅是最好的武器靶场和战术演训场,同样也是绝佳的文学现场和心灵试验场,把年轻的男女军人们放在此地,也许才能更清晰地展现他们的抉择与放弃,才能更尖锐地呈现他们的欢乐与痛苦,才能更自然地表现他们的相聚与别离,也才能让读者更深切地感受到和平年代被人所忽视的军营世界与迷彩般斑驳的军人内心。我试图在这部小说里探究年轻军人是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实现精神成长,如何在时光和风沙的磨砺中寻找生活意义,如何在不为人知的所在中坚守职责,这听上去可能有点老生常谈,但我想,这其实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找寻与追寻。

当然,一切的前提是我得在写作中做到尽可能的真诚,我不确定自己做到了何种程度,毕竟这是个无法量化的指标。所以我写作的时候,总是会停下来问自己,你写的这些你到底信不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继续;如果不是,那就再想想应该怎么写。无论如何,我希望自己是真诚的,也努力把真诚注入笔下的人物,至少能让我自己相信,他们或许真的就生活在沙漠中的某处。正如托尔斯泰在《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的结尾中所言:“这个故事里的英雄是我全心全意热爱的。我要把他美尽完善地表达出来,因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他永远都是美的。这英雄不是别的,就是真实。”

■新作快评 张学东中篇小说《蛇吻》,《十月》2017年第6期

罪案中的人性审视与探索

□王春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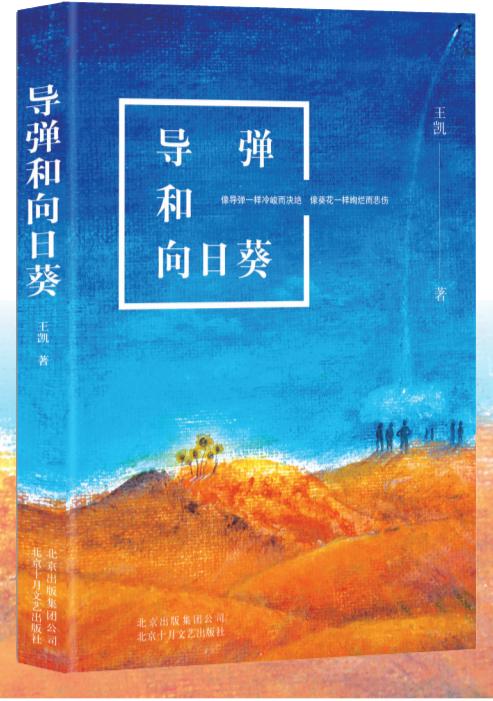
面对张学东的中篇小说《蛇吻》,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引自米兰·昆德拉的那句题记:“受了伤害的爱情常常以憎恨的形式表现出来。”小说艺术上的一大特点,就是峰回路转的艺术结构的精妙设定。

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性。作品一开始,“我”想方设法地纠集当年的大学同学周枪、赵剑一起去野餐,试图以这样的方式缅怀自己当年的青春岁月。就在我差不多要断定这仅仅只是一篇以同学情谊为主题乏味小说时,作者却笔锋一转:全班同学爬过一道山梁,意外地发现了一段古长城,“风化得圆滑隆咚的,更像一只塌了气的包子,没有一丝棱角,就那么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趴在杂草和乱树中间。”全班同学便都嚷嚷着要全都爬到这个土包子上拍照合影留念。就在攀爬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故,一位男同学不小心“跟头骨碌碌地翻滚下去了”。正在大家想方设法帮着这位同学脱困时,又一个意外发生了:“就听轰隆一声响,手里的这棵酸枣树连带着大块大块的土包一起坍塌下来,霎时土烟弥漫,我的眼睛彻底被迷住了……”谁都难以料想到,土包子坍塌后,竟然暴露出一个自然形成的葫芦形洞坑:“一个像狗样蜷缩着的人形头朝里脚朝外倒在洞内,由于土坯坍塌时落下了厚厚的土尘,使得躺着的那位的头发相貌乃至衣着全被覆盖住了。”就这样,伴随着一具女尸的突然现身,《蛇吻》在不动声色之间彻底地翻转为一部罪案小说。

老谭杀人后,把尸体掩藏在河湾水库那段古长城下的洞坑里,原以为百无一失,没想到竟被自己的大学同学无意间给撞破。这种阴差阳错的人生吊诡,让“我”感到不是滋味:“我也忽然间意识到,自己更像是一个可耻的告密者和揭发者,或者,我们一班同学集体无意识地检举了这个可怜的

男人。”一贯隐忍的老谭,如何能够下得了手杀害自己的前妻?“电视上说据案犯交代,老谭之所以残忍地谋杀前妻,是因为当他看到这个女人,就会想起自己的儿子,就会陷入失独后无尽的悔恨和痛苦当中。”让根本不可能成为杀人凶手的老谭,到最后合乎逻辑地成为真正的杀人凶手,正是张学东这部中篇小说的出奇制胜之处。小说为什么要被命名为“蛇吻”?结尾处,作家借老谭之口给出了答案:“他说,你们恐怕还不知道,我和我前妻都是属蛇的。我们三个听了面面相觑,忽然又想起他那天讲过的‘毒蛇之吻’,顿时每个人喉咙里就像是哽着一根利刺,那滋味可真叫人难受。”何为“毒蛇之吻”?原来,就在他们三位第一次到河湾水库无意间撞见已然隐踪多年的老谭时,老谭就已经不无暗示地给他们讲述过“蛇吻”的故事:“两只蛇头在最高处唇齿相交,活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人正在忘情地狂吻”,“其中一条蛇真的不动了,奄奄一息,一定是僵死在对方的毒吻下,另一条则迅速挣脱了对方的纠缠和束缚,跃跃欲试吐着芯子,随时将要冲人直扑过来,老谭说他当时吓得半死,拔脚就逃出洞外。”

将现实生活中的老谭与前妻的悲剧性人生故事与这一场不无神奇的“蛇吻”联系起来,则他们彼此那充满着怨毒的纠缠,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人世间的一种“蛇吻”。人间情爱失却后的彼此怨毒,竟然可以达到你死我活彼此残杀的地步——小说的标题和内蕴由此而来。



一种客观的态度面对丰富驳杂的外部世界。客观性不仅意味着人物形象的精确和真实,更意味着写作伦理的强健和美学精神的开阔。

三

一部伟大的小说之所以不朽,首先是因为它塑造出了不朽的人物形象。但是塑造不出令人印象深刻、经得起反复言说的人物形象,恰恰是现代小说的一大危机。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小说最严重的病象正是经典人物形象的缺失。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作家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是否真正了解、熟悉、是否充满理解、悲悯和爱意。

在《导弹和向日葵》中,叶春风、罗慕、白雪歌、车红旗、兰甘、钟军等人物形象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就在于王凯循着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着力“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于生活的流态中写尽了上一个时代军队的重重积弊,道出了和平年代青年军人心中的无奈与苦涩。叶春风这个人物就是千千万万基层带兵人的代表,他们有文化、有理想、也有拼搏奋斗的志向。然而,在严酷的自然环境和艰难的政治生态中,叶春风和他的同学们尽管拼尽全力、左支右绌、心力交瘁,却依然难以实现自身的抱负与理想,只能为了现实利益、仕途进步甚至爱情婚姻而委曲求全、互相倾轧、遍体鳞伤。

当下的青年作家在小说叙事中,总是显示出一种简单和片面的倾向:每每将一种情感结构推向极端,而缺乏在复杂的视域中平衡地处理多种对立关系的能力。《导弹和向日葵》则始终是在复杂的网络中展开矛盾冲突和情感纠葛。叶春风和他的同学们之间、同学与同学之间、机关层面的横向联系、与基层的纵向关系,凡此种种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故事的推进和人物的成长都需要在这重重交叉的网络逻辑中才能实现。而军营和沙漠宛若庞然巨物,矗立在小说的景深处。冰冷、沉默,悄无声息地吞噬着周遭的生命,也消耗着内部的能量。小说人物如同陷入了一个巨大的磁场,不管如何逃离,怎样回避,终究逃不开这无物之阵的笼罩。王凯洞悉外部世界对个体生命的影响和改写,并将这一过程书写得纤毫毕露、惊心动魄。的确,我们的文学应该从狭窄的个人视域和封闭的内心世界走出来了,应该以一种客觀的态度面对丰富驳杂的外部世界。

四

疑难、反抗和救赎是《导弹和向日葵》核心的精神价值。王凯在极其有限的生活幅面中考察人物的内心和情感,没有对外部世界的激烈批判,有的是沉静深邃的灵魂自省。因为悲悯而理解,因为思辨而救赎。

“瀚海”作为小说的核心意象,不仅描述出沙漠的本质,更勾连着辽远而宽广的外部世界。沙漠如海般壮阔,而人物的命运就如同巴丹吉林沙漠深处的弱水,蜿蜒流过干涸、粗粝的河床。坚韧和严酷,逼仄和辽阔,诸多反义词构成的沙漠存在与海洋的意象遭遇,显得尤为意味深长。

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在小说中,王凯以诗性的意象和抒情的笔调显示出作家的理性认识、情感态度和道德立场。他不仅描写现实,而且解释现实,不仅传递经验,而且超越经验。《导弹和向日葵》作为王凯青春疼痛叙事的集大成之作,终于跳脱了狭窄庸常的底层视角,达至开阔辽远的文学气象。

■短评

一次文学参与时代的行动

——《两岸家园》的启示 □何平

这是文学“苏军”的一次集体亮相、一次集体行动——文学参与它的时代的行动。范小青、储福金、鲁敏、庞余亮、晓华、胡弦、梁晴……他们的身份是小说家、诗人、散文家、批评家,这次他们共同行动,只是为一个词下文学的定义,这个词叫“台商”。

“商”,自古以来就是影响文明进程和日常生活的重要人类活动,它也可以指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一群人。而“台”则是大陆和台湾两岸之一岸的“台湾”。我印象中,中国历史上能够像“台”这样被置于“商”之前的某些地理和地域还有“徽”、“晋”、“浙”、“粤”、“苏”等。这些地方的人无一例外地带他们所处时代的繁荣,而他们也通过他们的商业活动清晰地标识出有着各自地域文化特征和人的性格的文化形象。所谓“某某商”,其实是某某地方人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个性、气质和异乎常人的能力在“商”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因此,现在我们很容易从“徽商”、“晋商”、“浙商”、“粤商”、“苏商”等等想到他们和他们的时代。无疑,“台商”是属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40年中国梦想的一部分。

江苏是投资、发迹和创业“台商”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两岸家园”隐藏着民族和文化共同体的丰富情感内容。如其所指,当台湾同胞从自己生息的家园出发抵达大陆开始各自的人生创业梦想,他们并不是大地上漂泊的异乡人,他们在大陆是有根有家的。和任何时代的创业不同,台湾同胞在20世纪中后期以来大陆的商业及其他活动自然被赋予文化的认祖归宗意味。“家园”是家族聚居地,也是文化累积和遗存当代参与到我们日常生活和精神建构的人文家园。

当22个作家、诗人、批评家在给“台商”这个词下定义的时候,是22个“台湾人”,他们丰盈充沛的“故事”丰盈充沛了“台商”这个词。“台商”当然首先是因“商”而成就的一个“词”。对于作家而言,“商”是他们观测和把握今天的时代无可回避的。这种观察和把握自然可以从已经无所不在地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商业活动中进行,但我相信,这次22个作家对

22个台商的采访和写作经历肯定丰富了他们的“商业”经验,其症候也不一定只是体现在《两岸家园》这本书中,这次有组织的行动和实践性的写作对于这些作家未来写作的影响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

可以稍微展开一点思考的,《两岸家园》这种写作的完成方式在当下文学生产中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例。正是通过文学的“有组织”生产,作家和他们的时代建立了细节和真实的关系,从而有效地保证了他们写作处理现实的某一部分是正在进行的,是“活”的现实。如果我们不把文学研究局限在最后完成的文本,就能够发现当代文学生产过程中“组织”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所以,《两岸家园》可以作为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在我们当下文学生产中的一次积极尝试、一个成功的案例。不惟如此,它的意义还可以在新的时代作家何为等方面得到确认。

从文体的角度,《两岸家园》的写作也是对纪实文学文体的一次有效的现实激活,揭示出纪实文学的生命力在于能够也可以深刻地切入到行进中的中国,成为我们时代史诗性的文类,进而重建其文体尊严。

《两岸家园》的写作者并不是记者,也很少关心纪实文学作家,他们要依靠实地采访和田野调查建筑他们的文学世界。我们现在读到的,他们通过“纪实”完成了22个台商的个人史记,即“纪实”所包含的一手的、丰富的“实”,亦即定义之“义”,是家族志、政治经济史,是20世纪中后期两岸交流的百科全书,但这不是《两岸家园》文学“定义”的全部,文学是要勘探人性的幽微以及人和时代之间的生命缠绕,因此,《两岸家园》最后通向22个人的性格史和命运史。

22个“文学”的“台湾人”是参与《两岸家园》的22个作家最终要定义的。而在当代文学谱系中,我们最熟悉的“台湾人”是白先勇、余光中等笔下的怀抱乡愁的流寓者,现在他们在《两岸家园》归根,成为我们时代的“新台湾人”。这样看,《两岸家园》的文学定义才刚刚开始。

我希望自己是真诚的
王凯